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顏氏家訓譯注

〔北齊〕顏之推 著
吳玉琦 王秀霞 注译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顏氏家訓譯注

「北齊」顏之推 著

□ 吳玉琦

□ 王秀霞

注譯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Yanshi Jiaxun Yizhu

颜氏家训译注

吴玉琦 王秀霞 注译

责任编辑:孙洪军

封面设计:余 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5 插页 35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辽宁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印数:1—6 000 册 定价:21.00 元

ISBN 7—80626—283—0/I·48

前 言

(一)

中华民族渊远流长,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驰名环宇,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贤者相继,文明倍出,留给后人的著述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在这些著述中,有关家庭教育的“家训”、“家诫”、“家规”、“家礼”等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珍贵文化遗产。它对传播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以及教导子孙后代、整齐家风和维系社会的谐调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所云:“三代而下,教详于家。”我们的祖先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重视家庭教育,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宝贵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在不同时代和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当首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系统编撰成书的家教范本,也是辗转流布,经久不衰,历经千余年而不佚的最有影响的优秀之作。

《颜氏家训》一书问世于我国南北朝时期。

所谓南朝,是在东晋末年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由庶族出身的刘裕乘机扩充实力,掌管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于公元420年代晋称帝,立国号为宋伊始,史称刘宋王朝。公元479年萧道成灭宋,立国号为齐。公元502年萧衍灭齐,立国号为梁。公元557年陈霸先灭梁,立国号为陈,执政33年。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均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先后历经160余年,历史上把这一时期总称为南朝。所谓北朝,是在刘裕建立宋朝的同时,鲜卑

贵族拓跋珪于公元 398 年在代北(今内蒙古和山西省北部)重建政权,立国号为魏开始,史称北魏。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西两魏又先后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历史上把这五个朝代总称为北朝。从公元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起,先后历经 140 余年。由于南朝和北朝几乎同时并存,故合称南北朝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是东晋十六国以来南北分裂局面的继续。其主要特点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经济领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危机四伏,民族矛盾、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十分尖锐,整个封建社会呈四分五裂状态。其具体体现是:一方面是士族地主垄断政治经济大权,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苛刻地压迫与剥削,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揭竿而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关于这方面的史实,曾在梁朝做过官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一书中有形象的描述。他说,那些高门士族除了靠着享有的特权作威作福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临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不懂经书,却要雇人答卷;应邀参加宴会,他们不会吟诗做赋,只好托人代笔。他还说,在平素生活中,他们穿着宽大华丽的衣服,脚踏高底木屐,身体虚弱,不敢骑马,出门乘坐长檐马车,下车还要仆人搀扶。在梁朝末年,原梁朝的羯族降将侯景发动兵变,攻入建康之时,他们连跑都跑不动,只好怀抱着金银珠宝,躲在房中束手待毙。尽管这样,由于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一边反抗斗争,一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劳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在南方,北迁的劳动人民带去了中原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施用粪肥,推广牛耕,兴修水利,加强田间管理等,不仅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麻各种农作物的产量,而且还开垦大量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江南的麻纺织技术,冶炼技术,造纸、煮盐、瓷器和造船等

技术也有所提高,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出现了许多较大的城市。在北方,北魏第五代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不断加快汉化过程,在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三长法”、“均田制”及调整田租户调的征收额等,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且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使北方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自西汉王朝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历经东汉儒学与神学迷信相结合,至魏晋南北朝儒家神学受到猛烈抨击,其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适应这一历史时期高门氏族地主统治的需要,儒学从表面上看仍被官方所提倡,但玄学(道家思想)和释学(佛教思想)的实际地位却越来越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何晏、王弼是玄学的早期倡导者。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即“无为”,即“自然”,即玄妙的“道”。他们还进一步把“自然”和“无为”同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等“名教”加以调和,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论点。他们认为,“名教”是“有为”,有为出于“无为”,无为符合“自然”,因而得出“名教出于自然”。经如此这般地解释,原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同腐朽没落的高门士族任意放纵享乐就没有矛盾了,因为都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佛教最早流行于印度,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东汉已修建佛寺和翻译教义,到南北朝时期更加盛行于世。佛教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灵魂不灭论”,即一个人死后的灵魂可以转到另一个人的躯体之中。人在前世种下了“因”,今世就要结“果”;今世种下的“因”,就要结出来世的“果”。由此得出,今世享受荣华富贵,是前世修好的结果;今世贫贱受苦,是前世作孽的结果。这种以“人的灵魂不灭论”为依据的“因果报应说”,比儒家的“三纲五常”和道家的“玄学”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更加符合南北朝时期高门士族地主阶级用来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他们除把儒、道揉合

在一起外,还大力推行佛教。据史籍所载,南朝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宣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都城建康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并推广到城乡各地。北朝到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和尚、尼姑达二百万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调和儒家伦理思想与佛教的关系,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又抬出了老子,并尊他为道教的祖师爷、“太上老君”,成为天上的神仙,与佛教创始人并列。他们还把儒家的“忠国家”、“孝父母”等伦理道德思想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统一起来。至此,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学说与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完成了最初的融合。这是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当时高门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当然,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虽然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欺骗作用,但人民群众毕竟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一方面不断抵制和揭露地主阶级思想文化的欺骗,另一方面则不断创造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精神文明。总观南北朝时期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存在着反对佛教“人的灵魂不灭论”的无神论思想,还存在着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生产斗争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书法、绘画,以及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明。

(二)

颜之推的一生,正值我国封建割据、南北分裂的动荡岁月。如前所述,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北方一直处于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之下。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导致战争频繁,国家分裂。在北方,经历了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取代北齐、隋朝取代北周等更国易号的大变故。在南方,也经历了梁、陈两次汉族政权的交替,封建统治者虽都想偏安一隅,但也曾遭致了像侯景之乱、西魏陷江陵、隋朝灭陈等大的事变。颜之推在世的六十年间,南北封建统治者时常兵戎相见,互相攻

伐,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这些,颜之推耳闻目睹,身临其境。

论家世门第,颜之推的先祖为北方豪门望族,即封建仕宦大地主。其九世祖颜含,在西晋末年随晋元帝离中原而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故到江南后颜氏家族仍属“侨姓高门”。其父颜协,曾任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军府的咨议参军等职。据《梁书·文学传》称:颜协“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颜氏家训·文章》亦称:他的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无郑、卫之音”。足见颜氏之家不仅世代为宦,祖传望门,而且“世善《周官》、《左氏》学”,乃书香门第。

颜之推生于梁武帝大通三年(531),卒于隋初(约590)。字介,琅邪(今山东临沂市北五十里)人。他自幼聪颖好学,早传家业。因当时玄学清谈之风盛行于世,12岁时正值萧^①亲自讲授《老》、《庄》之书,他便预为门徒,但亦学《礼》、《传》,兼“博览群书”,且“无不该洽”,尤好作文,“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梁武帝太清三年(549),19岁的颜之推就担任了湘东王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少年得志。此时受玄学的影响,他也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如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0),颜之推21岁,绎遣世子方诸镇郢州,令其在郢州治所夏口(今湖北武汉)掌管记。时值侯景发动叛乱,攻陷郢州,颜之推被俘,按例当杀,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被囚送建康。次年,梁元帝承圣三年(552),梁军收复建康,侯景败死,颜之推重返江陵,任梁元帝萧绎的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他在两年时间内,得尽读秘阁藏书。梁元帝承圣五年(554),西魏军攻陷江陵,颜之推再次被俘,时年24岁。次年,被遣送弘农郡(治所弘农县,在今河南灵宝县北)李远处掌书翰。他不忘故国,蓄志南归,终于北齐文宣帝天宝七年(556)冒险逃至北齐,意欲由此返梁。不料在北齐都城邺听到梁将陈霸先废

梁自立的消息，方决意留仕北齐。自此，颜之推在这里度过了20年相对稳定的生活，曾在北齐先后充任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官职，主持文林馆工作并主编《修文殿御览》。在这一段时期内，颜之推一方面在仕途上屡有升迁，另一方面又谨慎行事以避祸全身。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他第三次成为亡国之人，时年47岁。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颜之推在都城长安做御史上士。后来周为隋所灭，他在隋文帝开皇中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便病逝。因其卒年不详，约为60岁。

颜之推作为南北朝时期十分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思想家，生平著述颇多。据统计，有《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训俗文字略》一卷、《集灵记》二十卷、《急救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稽圣赋》三卷、《证俗音字》五卷、《还冤志》三卷。他的这些著述，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存于世者仅有《家训》、《还冤志》及《观我生赋》一篇。从颜之推的生平活动不难看出：他虽出身高门士族，早传家业，知书达理，几朝为宦；但又生逢乱世，饱经忧患，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几乎性命不保。恰恰是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切身经历，造就了他的个性特征和思想主张，这在《颜氏家训》一书中有比较明显的反映。

(三)

颜之推经历了几十年改朝换代的风波，在统治集团掠夺兼并的战乱岁月中寻找出路，政治地位和祖传家业皆无保障可言，凭他的学问和才干，先后效力于四个王朝，三次成为亡国之人，这种坎坷流离的社会经历，使他比其它人对当时的社会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也更加透彻。

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颜之推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不知纪极，其统治就极难维持下去。要改变这

种危亡将至的局面,他认为只有走改良的道路,主张为政要宽猛相济,仁义与刑罚兼施,要任人唯贤,而不拘泥于门第;经济上要注重农业,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各尽其力,限制寺院僧尼的不劳而获;士大夫不可崇尚清淡,背弃周、孔之业,竭力调和儒佛,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并深信佛学的“形体虽死,精神犹存”的灵魂不灭论,而对玄学清谈则持批判态度。认为清谈空论无助于良风美俗的形成,无益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一切都是他一生坎坷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的颜之推,目睹士大夫家庭教育的衰微,“治国、平天下”人才的匮乏,以及士族子弟的种种际遇,深感保持家族传统、维系士族统治的艰难。为此,他在晚年之际,结合自己虽生逢乱世、几度遇险,但终因气节高尚,学问超群而得以转危为安,且在晚年仕途屡有升迁的人生经历,奋笔而写此书,希望子孙后辈也能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进而通过搞好修身、为学、处世来继承祖传家业和巩固既得社会地位。全书共七卷 20 篇,涉猎的内容、范围颇广,除《序致》、《终制》两篇主要谈及写作此书的宗旨和嘱托身后之事外,其余 18 篇则分别论及教育子孙的某方面问题。具体来说:《序致》篇讲的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写作宗旨;《教子》篇阐述的是如何对子女施行家庭教育;《兄弟》篇谈家庭中兄弟之间伦理关系的正确处理;《后娶》篇说的是男子后娶续弦可能带来的事端;《治家》篇谈了一系列的治家之道;《风操》篇论述了封建士大夫应遵循的各种礼仪、规范;《慕贤》篇是作者选贤任能人才观的专论;《勉学》篇劝勉子孙勤奋学习,严谨治学;《文章》篇谈如何学写文章;《名实》篇讲的是树立正确名实观,不务虚名;《涉务》篇谈的是“应世经务”,办实事;《省事》篇教诲子孙用心专一,不作非分之想;《止足》篇主张少欲知足;《诫兵》篇告诫子孙不可习武从戎;《养生》篇谈“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的养生之道;《归心》篇

教导子孙“皈依佛教”；《书证》、《音辞》、《杂艺》三篇，既记录了作者生平的学问，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对子孙在这些方面的要求和劝勉；《终制》篇讲作者对待死亡的坦然态度和丧事从简的嘱托。全书以家训的形式，以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平实文体，深刻阐述了自己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希望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文化精神通俗地灌输给子孙后代，试图达到“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即期望利用血亲伦常关系和长辈对晚辈的影响力、约束力，教育子孙后代“明教化”，其要旨就是要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义，朋友有信”的“絜矩之道”等儒家思想达到“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家教目的，并希望能更久远地“轨物范世，遗泽后昆”，使颜家子孙万代皆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而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小人”。这些思想，固然有许多消极落后的成份，但其包含的中华民族固有美德精华是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发扬光大的：

其一，尖锐抨击了当时士大夫教育的种种弊端，且站在社会政治的高度，把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士风和学风诸问题整合一体作为“大教育观”，提出把幼稚时期、成年以后及晚年时期均列为家庭教育程序的“早教”、“晚学”教育主张：他认为有条件的家庭应向古代圣王和贵族家庭那样进行胎教，以使胎儿在母体中便受孕妇言行的感化，出生后再聘请师保，导引其学习“孝仁礼义”；一般人家即便做不到如此，也应在孩子能够“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加以教诲，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引导，才能使其养成“使为则为，使止则止”的良好习惯。此外，颜之推认为，幼年时期的儿童“神情未定”，有着容易“熏染陶渍”的“可塑性”。即：“人在年少，神情未定”，一切还未定型，接

触的东西皆为初次,影响深刻,记忆持久,很容易接受教育和训练,进而形成良好的知识基础和行为习惯,并影响终生,正如孔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是学习的黄金时期,为了鼓励子孙们抓紧这一黄金时期学习,颜之推鼓励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与此并行,“家训”还倡导成年后的继续教育,即“及至冠婚,体型稍定,因此天机,倍须引诱”,更可贵的是颜之推强调“晚学”的必要性。因为人生世间,处境千差万别,能够受到早期教育的固然幸运,可有些人往往失去了少年、成年时期的学习机会,颜之推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该自暴自弃,而应当抓紧晚年的时间刻苦学习,决不能在思想上划地为牢,因为“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二,针对有爱无教、偏宠偏爱的现象,提出爱教结合、一视同仁的主张。颜之推反对一味溺爱和放任孩子,只有做到“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否则,“无教而有爱,……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知识,谓法当尔”。以至于“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同时,父母对待子女也应一视同仁,切忌偏宠,否则,不仅会丧失做为长者的威信和说服力,还会酿成家庭纠纷甚至演成悲剧。对此他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厚之,更所以祸之”。总之,无论是有爱无教,还是偏宠偏爱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爱护孩子,只有寓教于爱,爱教结合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原则。

其三,提倡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颜之推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才能有一个和睦相处的兴旺之家,否则就会:“行路则踏其面而蹈其心,谁能救之哉!”

其四,强调做人应端正志向,增进德行。他希望子孙后代成为“行道以利世”的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因此要树立远大的志向,走光明正大的道路,先读书而后参政,不要私心谋利,讨好权势,以期达到往上爬的目的。此外书中论及的躬俭节用、慎于交友、礼貌待客、尊重他人、爱护书籍、主张薄葬、反对迷信等思想观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同时,由于乱世的影响、家庭的熏陶,加之“独尊儒术”思想的日渐无力,使得颜之推的学说思想主流虽未偏离儒家传统的轨道,但在诸多具体的观点和主张上仍与儒家传统思想相背离:

其一,在思想信仰方面,虽然坚持以学习儒业为本,承传儒学传家的门风,但也对佛教的经论推崇备至。认为儒学与佛教的教义相通,互为表里,不应只归周、孔而背释宗。同时,对道教的思想也未断然否定,对各种杂艺亦提倡兼习,所谓:“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只是不要求对此专精。

其二,在伦理道德方面,虽然宣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人伦关系,并信守“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但也采取了因地、因时制宜的态度,故而三为亡国之人,历仕四朝。

其三,在立身处世方面,虽奉行“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但在把握尺度上有所偏颇。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做事情始终要把握尺度,要做到“少欲知足,”可他的言行却更趋向于“无多言”、“无多事”的“无为”思想。

其四,在修身为学方面,他虽倡导“正心、诚意、修身”,和“务先王之道”,但又特别强调全身保性和博览群书。故此他要求子孙:“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这与孔子等先儒所倡导的:“士当见危授命,临大节不可夺也”的在政治上力求积极参与,即使殒命也在所不惜的主张是不同的。他要求子孙们只要官居中品,不辱没官宦世家的门庭即可。同样勉励儿孙努力学习,博览群书,目的也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本领,以在乱世中求生

存。

(四)

《颜氏家训》这部封建文人教育子孙的家庭训诫，它虽是作者为了整顿自家门风、劝勉子孙而作，但由于书中内容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因而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得以广泛流布，反复梓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对后世产生了比较普遍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被奉为“家训之祖”。清人王钺在其《读书丛残》中曾这样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由此可见，此书在封建社会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国成书最早的家庭教育专著，而是因为它有着许多可以肯定的思想和主张。

首先，作为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颜之推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所谓文学之士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在揭露当时封建士大夫教育的空疏、腐败，士风、学风不正，及人才无用等弊端的同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且具有一定进步性的教育主张。

其次，提出了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崭新人才观念。他认为“国之用材，不外六种”，力主改革培养目标，主张培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的实用型人才。这是自汉、魏、晋至南北朝以来，继王充提出培养“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之后，在人才观念和培养目标上的又一次突破。

第三，作者立足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大教育”观，以及幼稚期、学习期和步入社会以后的“终身教育”观，阐述家庭教育问题，这是对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本书有较大的认识价值，它记录了南北朝这一特定历

史条件下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士族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史实材料,为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通史、思想史和教育史提供了思想成果和有用史料,而且其中不乏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遗产,可以说《颜氏家训》是一本进行多门类、高层次家庭教育的教科书。

当然,《颜氏家训》作为封建时代文人训诫子孙的家庭教育书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它不可能不带有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不可能不大量宣扬封建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比如,为保持儒学传家、仕宦门第的传统,教导子孙以儒学和仕宦立身的功利性。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及听天由命、全身保性、明哲保身的思想,都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和摒弃的糟粕。

(五)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历朝历代皆有刻本或抄本,但却很少有人注释,直至清代,才有了赵曦明的注本和卢文弨的补注本,并刻入了《抱经堂丛书》之中,今人王利器先生对诸种刻本进行校勘,撰写了《颜氏家训集解》,注释较为完备。近几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先后又有几本译注、全译、选译、汇注等本子问世。但多半是站在整理、诠释古籍的角度编译的。

我们译注这本《家训》,是从教育的角度入手,原文采用了宋人朱熹编辑整理的七卷本《诸子集成》中的《颜氏家训》,同时参阅了赵曦明与卢文弨注本,以及王利器先生编纂的《颜氏家训集解》本,也借鉴其它译注的精华。尽量把握原作的主旨,对全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和今译,力图呈现给读者一本翔实的家庭教育的历史读本,使读者在现代高节奏的生活中,在日益提上日程的家庭教育中,有一本可以鉴古及今、可圈可点的家教指南,尤其是书中关于早期教育、寓教于爱和加强道德、立志、语言教育的主张,及严谨治学、虚心学习、应世经务的思想,对于我们

今天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家教方式、方法具有很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其中有一些理论在今天仍有很强的操作性。

最后,本书吸取诸多“家训”译本的精华,在此一并致以衷心地感谢。愿我们共同把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弘扬光大,使其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译注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长春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序致第一	(1)
教子第二	(8)
兄弟第三	(23)
后娶第四	(33)
治家第五	(44)
卷二	
风操第六	(63)
慕贤第七	(112)
卷三	
勉学第八	(125)
卷四	
文章第九	(184)
名实第十	(222)
涉务第十一	(234)
卷五	
省事第十二	(243)
止足第十三	(258)
诫兵第十四	(264)
养生第十五	(270)
归心第十六	(277)